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99-2006)

Volume 2 新第二期 Article 19

10-2000

《丁汝昌集》(戚俊杰、王記華)

Youyuan MA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9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馬幼垣 (2000)。《丁汝昌集》(戚俊杰、王記華)。《嶺南學報》，新第二期，356-358。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99/vol2/iss1/19

This 新書評介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99-2006)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丁汝昌集》，戚俊杰、王記華編校，戚其章審訂。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18+(4)+16+5+(1)+378頁。

清季人物對時局有影響者，其文稿倘能成集，多賴在其逝世後不久，門生故舊代其輯存刊佈。不然時日一久，散失必甚。吳汝綸(1840-1903)編的李鴻章(1823-1901)《李文忠公全集》(1905年)、許同莘(？-1922年前後在世)編的張之洞(1837-1909)《張之襄公全集》(1918年)雖非至善，然大體已備，用者稱便，理即在此。

惟遭橫死者，稿件於其遇難時本已不易望其完整，門人親友於集刊之事亦不免有所顧忌。待事過境遷始作籌謀，即使拖延不算久，文件散佚致缺漏重重仍幾無可免。民初盛沅等編因庚子事變而遭棄市的許景澄(1845-1900)之《許文肅公遺集遺稿》(1918年)，就算連同《許竹篔先生奏疏錄存》、《許竹篔先生出使函稿》、《許竹篔侍郎尺牘真蹟》等較次要的集子合用，述事之不連貫，關鍵之無從解釋，仍殊為嚴重，即為顯例。倘時至今日始試編許集，成績必還要再打折扣。

皖人丁汝昌(1836-1895)，陸軍出身，得李鴻章青顧，委以興建北洋海軍重任。當北洋海軍發展達壯盛之境時，亦即丁汝昌畢生事業臻最高峰之際。待北洋海軍熸師威海，丁仰藥自盡，朝廷亦以見罪，則處境截然不同矣。前述難於身後旋有文集刊行之局遂成，且得候至近百載已過始有轉變之契機。

八十年代中期，王爾敏(1927-)、陳善偉就香港中文大學新購得的盛宣懷(1844-1916)文獻原件抽選其友朋來函，編刊為精裝大型開本九冊之《近代名人手札真蹟：盛宣懷珍藏書牘初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7年)。其中第六冊，頁2728-2759，收丁汝昌來函十四通。這是彙集丁汝昌文件天時、地利、人和開始得以配合之轉機。付梓時，各件悉以景印出之。此固可保原貌，惟丁汝昌所作行書、草書每有不易辨識者，頗足影響文件之運用。

稍後，謝忠岳據天津圖書館藏品，編刊為兩冊之《北洋海軍資料匯編》(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4年)；上冊，頁1-564，題為〈丁汝昌海軍函稿〉，收丁汝昌所書信件376通。對研究甲午諸海役者而言，此組數目偌大的資料之出現仿如天授。但因亦用景印法刊出，用者所遇困難也與援用王爾敏、陳善偉所編刊者同。

《丁汝昌集》即彙此二來源，配以早已用排印法公開之丁汝昌致戴宗騫(1842-1895)函四通，共得394件而成。有此集在手，用者不獨去辨識行草書之難，復因各件順序排次，可較易掌握事件發展之脈絡。惟於中文大學藏品，或因提供者交代不清，並未注明來源。

此主體部分外，該集復益以兩組雙向電稿作為附錄。

第一組為據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電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87年)，三冊，以及戚其章編，《李秉衡集》(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輯出的〈丁汝昌與李鴻章、譯署往來電稿〉，頁228-333。這裏有兩事要說明：(一)上述李鴻章全集三冊，每一冊均有輯出的電稿，並不如此書頁377 所說的輯自出版於1984年者(該版全集最先刊售的一冊出版於1985年)。(二)所輯出的電稿不少收發人均不是丁汝昌，而僅是內容與丁汝昌有關而已。此等文件不能算作丁汝昌的筆墨。該版李鴻章全集既甚流通，研究甲午戰爭者幾人手一份，丁汝昌不是收發人的電稿可不必浪費篇幅收錄。

第二組為據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甲午中日戰爭：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輯出的〈丁汝昌與盛宣懷往來電稿〉，頁334-353。這附錄顯有補充的必要，因為利用香港中文大學所藏的盛宣懷資料而編出來的幾套史料集單量篇幅，就算不計上引的《真蹟》，厚度也比陳旭麓等所輯者多出好幾倍。一查便知真如此。吳倫霓霞、王爾敏編，《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年)，頁75、92-93、130、138-139、153、155、181、186，果有盛宣懷致丁汝昌電稿八通(內有一件而發給多過一個收件人者)，均可補入此附錄內。中文大學所藏盛宣懷資料尚未全部刊印出來，與丁汝昌有關的資料或尚有其他。

附錄另還有兩個：〈日本海軍司令伊東佑亨誘降信〉，頁354-356；〈丁汝昌年表〉，頁357-376。

簡言之，《丁汝昌集》的用途在便人，而非在發掘未知見的新資料。

然而此集之刊行帶出一新問題。集中所收各件不出尺牘與電稿兩文體，悉為公文，且除眼前公事外，鮮有別的話題。丁汝昌或無

寫日記之習，不必以或未得存而引為憾事。惟自李鴻章委丁出掌北洋海軍(初雖未成軍，仍可用此名)，至威海燈師，悠長十五年有餘，丁氏以一介傳統陸將從事籌海，殆自零出發，倘有責任感，於籌建之苦樂、經驗之積聚、世界海軍(特別是日本海軍)發展之觀察、個人之進修(包括掌海軍者不能不懂的英文)，不可能從不寄諸筆墨，從未嘗與友人和同僚討論，從不向專家請益(特別是非海軍出身的海軍專家，如許景澄)。續尋丁汝昌之作或可以此為方向。

馬幼垣
嶺南大學